

【思想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潘俊杰¹, 魏 婧²

(1.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为载体。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是这一时期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下文化转型的标志和丰硕成果。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是先秦诸子学术兴起的历史土壤; 诸子百家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和途径对文化进行重建, 形成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 礼乐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 是先秦诸子学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文化的多样性和“求变”的时代特色构成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显著特征。先秦诸子学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历史性转型下的文化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 文化转型; 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3-0009-05

Culture tur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AN Jun-jie¹, WEI Jing²

(1. Institut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times is the carrier of the culture tur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times is the symbol an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that ear. The social crisis and cultural crisis by the historical social turning is the soil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times. The turning from spirits of “Li Yue” culture to rational and humanistic cultur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culture turning. They constructed new culture from various angles, methods and channels which lead to different patterns of culture turning. Varied culture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ous changing is the notable feature. The common rules of culture turning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times have several enlightenmetns to the cultur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historical turning of social background at present.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and their expon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times; culture turning; enlightenment

一、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和剧变的时

期, 社会的动荡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共同构成了历史壮丽的奇观。先秦的诸子学术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并兴盛起来的。诸子学术的兴起、发展、成熟过

程记载了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危机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产生和文化转型创造了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往往被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古代社会按生产工具一般可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国的夏朝为石器时代,商、周两朝为青铜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为铁器时代。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铁”字最早见于《诗经》中“駉孔阜,六轡在手”^[1],描述的是秦襄公(公元前 776~764 年在位)出猎时乘着四匹铁灰色大马驾的车,“駉”字即“铁”字,可知在西周春秋之际已开始运用铁器了。春秋时期铁器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更是如此。1976 年湖南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墓中出土铁剑和铁鼎各一件;1978 年在河南浙江下寺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玉柄铁剑一把。而在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发掘的铁器则更多,例如河南陕县第 2000 号墓中出土的金质格手铁短剑;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葬中的铁铲、铁凿、铁斧、铁锤等工具;河南洛阳水泥厂遗址中出土的铁镢、铁铲等^[2]。铁器普遍地运用到军事、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在社会生产方面,铁工具以其坚固和锋利提高了开垦耕地的能力和耕作的效率,农业收成有了显著的增加。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铁制手工业作坊大量增加,社会分工更加细化。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与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二是代表这两种生产力的旧的统治阶级和新生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为社会的动荡、变革和文化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另外,春秋时期,由三代发展起来的井田制度遭到严重地破坏。公元前 685 年齐国“相地而衰征”,公元前 645 年晋国“作爰田”,公元前 594 年鲁国“初税亩”,公元前 543 年郑国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措施,这些改革都有打破“公田”和“私田”界限按照土地数量和等次征税的性质。同期,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楚国“为掩书土田”都是按土地的数量和等次来摊派军赋,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具有封建性质的社会阶级的转化和重构,即由贵族和商人转化而来的贵族地主阶级,如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和一些商户大贾转化来的地主,同时还有由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的个体农民阶级。在同一时期内,

社会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3]的个体私营手工业者和私营商户。到了战国时期这一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封建性的私有制几乎在所有诸侯国发展起来,以地主和农民来划分阶级构成的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奴隶制的母体内被孕育出来了,新旧生产关系的争锋与斗争开始了。

此外,在政治方面,围绕着“争霸”战争的需要,春秋以至战国的整个历史阶段内诸侯国们都在不停地进行着政治方面的改革。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赵国的公仲连、燕国的子之等分别在这些国家进行变革。这些改革的内容涉及用人制度方面变“亲亲”世卿、世禄制为任人唯贤制,奖励耕战,制定法律制度等。经过改革,公室宗族逐渐衰亡,卿族甚或平民贵族势力增强,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人治”逐渐向“法治”转化。这些都为文化的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潮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其次,思想文化方面春秋战国也为诸子学的产生和文化的转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春秋时期,自商、周以来所形成的宗教思想发生动摇,卿大夫中一些有文化远见的人物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新的文化因素开始萌芽。例如,重民轻神言论的出现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随国贤者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4]周臣史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4]春秋晚期,无神论的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晋臣士伯评判薛人与宋人争论时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4]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4]他反对以“天道”附会人事。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法思维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标志着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周卿士单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5]认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象,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是自然界的规律现象。春秋后期,阴阳五行说还与具体科学如医学结合在一起,例如中医里的“五味”、“五色”、“五声”、“六疾”等都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重民轻神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说明春秋时期的思想开始逐步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

西周发展起来的“礼乐”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学界多以“礼崩乐坏”来概括。至于礼乐是如何崩坏的,礼乐崩坏从文化内部的分析却不是很多。来自文化内部的因素很可能加速了礼

乐文化崩溃的进程,春秋时期“重法”的思想正是具有破坏性的因素。从西周发展起来的礼乐文化本身也包含有法制思想,西周的“五刑”及其3000余条律文足以说明西周法治思想的发展。西周实行的是“德主刑辅”的道德政治,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分化的重构、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礼乐这种道德政治已经规范不了社会,于是重视法律与法制的思想兴起。公元前535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公元前512年晋国“铸刑鼎”都直接对以“德治”为核心的礼乐文化造成强烈地冲击。到了战国中叶法家的兴起与显赫,“重法”与“变法”的思想对礼乐文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为什么说是“重法”的思想和法家文化对礼乐文化的崩溃起了推动作用呢?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代,“重法”的思想首先顺应了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其次“重法”的思想以及后来法家的思想同时也适应了春秋战国争霸战争的需要,而礼乐文化显然是适应不了历史的这种发展趋势。春秋战国时期,由“重法”思想发展起来的法家学派在当时的显赫程度,是任何“显学”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一个明证。

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掌握文化知识的都是卿、大夫一类的人物。到了春秋时期旧时的王官之学逐渐废弛,学术下移民间私学兴起。以孔子为代表,他著书立说、传授弟子,主张一切人“齐之以礼”^[3]实践“有教无类”^[3],从而使知识文化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同一时期内,地域文化也得到快速地发展并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例如,当宗教文化在中原各国普遍动摇时,在秦、楚、吴、越等国却产生了超出以往的影响。以中原各国为代表的北方与以楚、越为代表的南方,各自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和内涵,也为诸子百家学术的丰富多样性创造了条件。

二、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内容、模式和特征

诸子学术的兴起,可以说是在夏、商、周文化总结基础上的一次文化重建,也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文化的一次巨大转型,诸子百家就是这一转型期的卓越代表。

文化重建或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主导性文化精神的重新确立,也是文化转型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夏代的巫觋文化到商代的祭祀文化再到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关于礼乐文化,陈来说:“周礼是从氏族习俗演化出来,原生的氏族文化转变为再生的宗族文化,独特地

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意义与功能的礼仪文化体系。”^[6]陈来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起源与性质的论述是很正确的。礼乐文化的主导文化精神是“德”、“礼”、“天”。到了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礼仪文化渐渐转化,形式化的仪典文明渐渐转变为理性的政治思考和道德思考”^[7]说明春秋时期理性思潮的泛起,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这一理性思潮同古希腊的理性思潮比较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西周至春秋发展起来的理性化思潮,其特点是,这一理性不是体现为注重技术文明或科学知识的用以改造自然世界的理性,而是一种政治的理性、道德的思考、实践的智慧和。”^[7]古希腊的理性则表现为注重技术与知识的理性。理性思潮只是春秋文化发展的一方面表现,与此同时,春秋文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人本思潮的兴起,“与春秋时代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思想文化在春秋时代的特色却是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本思潮的兴起。”^[7]理性和人本两大思潮的兴起,无形之中已悄然构筑起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这一时期主导文化精神的转变,正是从礼乐文化那种伦理宗教性的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

诸子学术兴起和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旧有的文化不再能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自然、社会、个人之间关系,如何治理社会、国家,如何安顿人生等课题。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他们的思考和理论探索的。但是,由于各家各派进行文化重建时的角度、方法和途径都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于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因此,我们暂且可以将儒家称为诸子百家中的历史学派;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道家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实际是摆脱了传统宗教和文化习俗在哲学高度上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诸子百家里

的哲学学派;法家从政治法律层面去分析解决时代的课题。法家提倡“不期修古,不法常可”^[8]要因时而变,这几乎就是纯粹的政治革新派的主张。我们也可以暂且将其归结为诸子百家中的政治学派;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信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我们暂且将其称为诸子百家里的宗教学派。诸子其他各家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研究解决问题,为着解决相同的时代课题,却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切入点和学术路径,最终又都落脚于对社会人生的论述上,正可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9]。

春秋战国的文化转型形成了其显著的特征。其一,诸子百家各自在构建其思想体系时始终面临着一对矛盾,即“述”和“作”的取舍选择。各自的侧重点和取舍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色。儒家注重于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就具有了保守主义的特色;道家突破传统“截断”文化之流力图使社会和人生摆脱各种束缚,因而具有自由主义的特色;法家提倡政治社会的变革,对现实的关注多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墨家以宗教似的说教完备其理论体系,具有神秘主义的宗教倾向和特色。诸子其他学派文化转型的特征在此暂不详述。其二,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处于不停地剧变之中。因此,文化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历史的旋律,即“变”与“求变”的思想。讲“变”与“求变”最多的是《周易》。例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1]、“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9]、“变通者,趣时者也。”^[9]还有“终日乾乾,与时偕行。”^[9]《易经》中关于“变”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春秋战国儒家思想的发展,如孟子就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10]就是说孔子是顺应时势变化、识时务的圣人。孔子自己也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3]而且,《周易》中变化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诸子的其他学派,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当作“变”的哲学来理解。庄子说:“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11]。法家的韩非对于变异的思想则论述的更为透彻,他说:“世异则事异”、“是以圣人不可修古,不法常可”^[8]有鉴于此,在他的法治理论中曾提出“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8]为什么诸子的思想中都提到“时”与“变”的观念?笔者以为,春秋战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的剧变时期,文化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理论的抽象,一方面是对社会“变”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包含有人的理性化的思考和理想化的创造。因此,可以说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既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描述,又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人生的理想化的构思和设计;我

们也可以说诸子百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他们未来时代文化的奠基者,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总之,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是他们回应那个时代社会转型的丰硕成果,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场文化转型。

三、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及启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具有以下几条规律:

其一,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是相伴而生的。春秋战国是社会历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型时期,亚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他说:“如果历史有一个轴心…发生于公元前 800 至 200 年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与我们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12]帕森斯将这一时期称作“哲学的突破”。但是,无论是亚斯贝尔斯还是帕森斯他们对于四大文明古国轴心期的变化特定的历史渊源都不能给出具体而确定的解说。^[13]中国也不例外。笔者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剧烈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春秋战国的文化转型。反过来,迟至西汉初期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最终完成,不仅塑造了两千余年中国的封建社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

其二,文化转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其基本的方法。诸子百家在构筑其思想体系时对于前诸子时代的文化,几乎都采取了“述”与“作”相结合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儒家对于两周文化推崇备至,孔子在总结三代文化遗产时提出要“述而不作”,对两周文化几乎可说是全盘接受,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6]这是儒家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一面;孔子作《春秋》并在书中带有自己的价值评判,这是一种文化的创造和创新。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0]说明孔子将学术创新也当作自己的事业之一。再以道家为例,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对于文化和文明进步几乎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对前诸子时代的阴阳思想和辩证法思想都有所继承,同时他们又开创出先秦文化发展的另一路向,道

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创新多于继承。儒家和道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学术倾向,使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后来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有学术上的联系的,儒、道思想互补的结合点在于它们都是从上古文化之根上生发出来的,他们都继承有前诸子的传统文化。其余像法家、墨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等各家,都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因此,继承和创新是文化转型或文化重建的根本方法。

其三,文化转型需要文化自觉和文化的多样性。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都是因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而做出的理论思考。学人的历史责任感在他们的学术中体现为文化的自觉精神。同时,文化转型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前文已述,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不同的文化重建模式具有现实借鉴价值。

其四,文化转型需要从实际出发及时确立起主导性的文化精神。上文已论及,春秋战国的主导性文化精神,是从礼乐文化那种伦理宗教性的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理性和人本为核心的文化精神,构筑起中国封建时期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标志着中国奴隶制文化向封建时代新文化转型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变革时期,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所苦苦追求的现代化最终步入历史的正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终于落到实处。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转型的讨论也日趋热烈。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转型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目前,中国文化转型依然滞后于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文化转型的难产给现代化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例如,社会伦理道德滑坡,法轮功等邪教的兴起给社会带来骚乱,思想文化的混乱造成的精神危机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阻碍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成功的文化转型不仅能消除以上各种弊端,而且可以塑造新的中国未来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以诸子学兴起为标志的文化转型,给我们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其一,文化的转型是建立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之上的,现当代的文化转型或文化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现当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与文化转型的滞后对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利的,因此必须加快我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其二,文化转型必须是继承与创新兼备,偏执一端都是不科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外国先进文化的精华,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其三,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转型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不仅要求学人要有坚定的历史使命感,而且要引导社会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其四,春秋战国文化转型,是从“礼乐”文化“德”、“礼”、“天”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向封建性的理性、经验、人本的文化精神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目前文化转型的性质、模式和主导性文化精神。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转变。这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包括两种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一是技术理性或称为科学理性;二是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是以个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它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以群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人本思潮。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文艺复兴从起始到其主导性文化精神的确立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转型前有春秋战国文化转型的历史经验,后有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借鉴,这一历史进程一定会少走历史的弯路。

参考文献:

- [1] 毛亨传.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上)[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2] 河北省文物局工作队.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1965,(1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J].考古,1975,(4).
-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5] 李维奇标点.国语·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6]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上海:三联书店,1996.
- [7]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2.
- [8]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9]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8.
- [10] 杨伯峻.杨逢彬译.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
- [1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亚斯贝尔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杨彬智]